

——以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战争为线索

近代东亚佛教

何勁松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中日历史研究中心文库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文库 ·

以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战争为线索

近代东亚佛教

何勁松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近代东亚佛教——以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战争为线索/
何劲松著.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4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文库)
ISBN 7-80149-684-1

I. 近… II. 何… III. 佛教—研究—东亚—近代
IV. B949.3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2)第009994号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文库·

近代东亚佛教

——以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战争为线索



著 者: 何劲松
责任编辑: 梅小璩 杨 群
责任校对: 杨蔚琴
责任印制: 同 非

出版发行: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5号 电话 65139963 邮编 100732)
网址: <http://www.ssdph.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排 版: 北京中文天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增富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开
印 张: 10.75
字 数: 250 千字
版 次: 2002年4月第1版 2002年4月第1次印刷

ISBN 7-80149-684-1/B·114 定价: 22.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中日历史研究中心文库
编辑出版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名单

顾问 王忍之 郭永才

编辑出版委员会

主任：何秉孟

委员：蔡文兰 孙 新 谢寿光 徐辉琪
王 正 杨 群 徐思彦

执行编委：王 正 杨 群

编 务：周颖昕 何 平

学术委员会

主任：张海鹏

委员：王桧林 王效贤 关 捷 刘楠来 张宪文
张振鹑 胡德坤 黄美真 解学诗

总 序

王忍之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为了进一步推进中日关系史以及抗日战争史的学术研究，为了以历史事实教育中日两国的年轻一代，主持编辑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文库”。

1995年8月15日，时任日本首相的村山富市在内阁发表讲话，承认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对亚洲各国的侵略。同年，日本政府实施为期十年以亚洲邻国为主要对象的“和平交流计划”。作为该计划的一环，日本外务省决定在日中友好会馆内设立日中历史研究中心，并且希望我国提供协助。中日双方有关部门通过协商方式确认了如下原则：在切实遵守中日联合声明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原则和精神、承认日本军国主义对华发动侵略战争这一历史事实的前提下，中方同意接受日方的要求，提供必要的协助。中国社会科学院接受我国外交部的委托，作为协助日方研究的中方窗口，与日方联络、协调相关事宜。

1997年8月，日中友好会馆致函中国社会科学院，再次要求就协助进行历史研究问题进行协商，提出“只有作为受害者、抵抗者中国的参与，历史研究事业才能达到所期的目的。这点正是需要中国协助的”。日中友好会馆还表示，愿意将该馆的相关

经费拨出一小部分交中方使用。经过协商，基本上达成了一致认识。为此，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正式建立了“中日历史研究课题”，通过课题指南形式，在国内公开招标研究者。课题招标范围在 1974~1945 年间，着重研究日本侵华的历史以及这一时期与此相关的中日历史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专家委员会对课题申请进行评审。经评审通过的课题，中日历史研究中心视各不同课题的内容、工作量的大小给予经费资助，以助成其研究计划。

这样的年度课题招标，从 1998 年起，每年进行一次，每次约有 15~20 项课题申请得到通过。最早通过的课题，有的已经完成，并通过了结项手续。为了反映中国学者有关近代中日关系历史的研究成果，使它能被社会所了解，充分发挥它进行学术探讨、揭示历史真实的作用，以便今天的青年一代了解在中日关系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那些给中国人民带来沉重灾难、也给日本人民带来巨大创痛的事件，我们决定从这些成果中选择一部分出版，总题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文库”。同时，文库也包容了国内学者撰著的一些涉及中日关系的著作。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文库”力图向中国年轻一代，也向日本年轻一代提供认识历史本来面貌的真实材料，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希望所谓历史认识问题不再成为改善中日关系的一大障碍，希望中日关系向着睦邻合作、和平共处的方向发展，真正发挥东亚两个近邻国家之间经济上互补互助、文化上互相学习尊重的精神，在难免发生矛盾和冲突时，永远不诉诸战争。

是为序。

序 言

何劲松博士选了一个很重要的研究课题。这个课题涉及的历史背景，是中日两国人民，东亚各国人民，也是全世界人民永远都不能忘记，也不应该忘记的。我支持这样的研究课题，当时还有许多联想。现在看到这成果的目录，却突发了另外一个想法。

一种宗教，尤其是像佛教这种连蚊虫一类生命都慈悲有加，律禁伤害的宗教，竟会成为军国主义对内镇压，对外侵略，进行大规模屠杀的帮手和粉饰品。我们对这种现象，应该怎样评价呢？而这同一种宗教，有的或直接参与抵抗和反战运动，或不合作，保持距离，反映了人性天良、人间正义，成为战胜法西斯宏伟的历史画卷中不容遗忘的一页，我们面对这种现象又应该怎么评价？

我们学术界有过一场时间不短的争鸣：宗教的社会功能，究竟是消极的，还是积极的？是反动的，还是进步的？双方似乎都能找到充分的事实来支持自己的主张。这一争论所反映的意见分歧，大约最后也没有得到真正的统一，尽管随着政治气候的变化，也可能有貌似舆论一致。其不能真正统一的原因，是这两种主张都能找到历史的或现实的事实作为根据，而且这些事实是不容反驳的。像本书所提供的情况，就是如此。因此，我以为问题的关键可能不全在事实本身，而是出在观察宗教现象的方法

上。

不管给宗教下什么定义，也不论人们对宗教有什么样的认识，抱何种态度，但有两个方面，我以为必须分开：一是宗教的信仰，一是宗教的组织；一是个人的宗教信仰，一是信仰宗教的个人。我们不能忽视这两个方面的联系，也不能抹煞二者的差别。我们在讨论宗教的社会功能问题时，之所以会产生上述对立的意见，与将这两个方面混为一谈，有极大的关系。信仰是心理范围的事，也可能形成特定的意识形态，严格讲，是纯粹个人的私事，所以信仰基础赖以建立的宗教经验，不可能与他人共有；宗教组织则是一种把信仰者纳入必须接受其教义和戒禁约束的社会集团，信仰者个人至少在信仰层面得受控于这个集团，这也给宗教团体全面控制和支配信仰者个人，提供了方便条件。近代以来，西方不断发生反宗教的运动，实质上多数是反教会运动，即要求把信仰的权利，从教会的垄断中收归己有。这与无神论者同时也从信仰层面反对宗教，是大不相同的。

作为一种特殊的心理或意识形态，信仰只是个人精神生活中的非理性或由理性支持的非理性一面。人的精神生活还有更重要的理性一面，也会有比信仰更重要的其他非理性的，诸如本能、感情等的需要。把信仰定位为人生惟一的，或主要的需要，是一种偏见。从人的属性说，中外古今，被人们界定，屈指可数的就有许许多多，但其中恰巧没有信仰一项。也就是说，信仰并不构成普遍的人性。至于经济和政治，文化和职业，即人的社会性，对于人的影响又远大于人的其他属性。因此，作为个人的信仰，理应只限于他的精神世界和与之相应的宗教活动；而个人作为社会的人，作为社会关系的总和，他的社会活动，他对社会的作用和影响，或可能与他的信仰有联系，或可能没有联系，二者之间，不能简单地抽象为因果关系。

宗教组织之作为一种信仰者的社会团体，信仰者个人之作为一个社会的人，从根本上是受社会历史的制约，它们和他们的社会地位、经济利益、政治立场决定他们社会活动的性质，换言之，它们或他们的社会活动、政治倾向、道德尺度，以及对社会政治、道德尺度的解释，首先与他们的社会性直接有关，与他们奉行的信仰没有必然的联系。因此，根据某个宗教团体或某个信仰者个人的社会作用和政治倾向，给这种信仰自身下社会政治结论，就不会是全面的；有些团体或信仰者个人，总是把自己从事的社会活动和政治活动，渲染成是它或他的宗教活动，是他们信仰范围的事，甚至用宗教信仰的名义裹胁他们的信徒，去从事这些信徒并不一定愿意从事的社会政治活动，这其实是在有意把水搅浑。因此我以为，对宗教组织或信仰者个人的社会政治活动，应该从他们的社会性上考察，而不宜单纯从信仰上追究。这也是为什么同一种佛教，既会被用于战争，也会致力于和平。

众所周知，政教合一的体制，曾经是维护西方黑暗时代的主要上层建筑，也是发动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宗教战争的支柱；而教会对于教育的控制和垄断，又是导致全民愚昧、支撑封建专制主义的重要手段。资产阶级革命的伟大成果之一，就是政教分离，教育独立，宣布宗教信仰自由，让信仰变成纯属个人的私事。宗教信仰一旦成为个人的私事，个人就拥有了自由选择 and 自由取舍的充分权利，人们的政治主张和思想行为，再也不必经过神圣化的扭曲，听命于某个宗教组织或神职人员，而可以直诉于社会，并对社会直接负责。这意味着人本主义的胜利，人性的回归，是思想解放和个性解放的一个极重要方面。

这都是老生常谈。现在旧话重提，是因为实在有重提的必要。除了学术上的原因，更多是由现实问题引起的。二次大战以后，世界性的舆论是和平，友好。这也是宗教界参与社会活动的

主流口号。而后，不少宗教团体和宗教界人士进一步提倡交流，对话，理解，让世界充满爱，总而言之，是希望消除历史遗留下来的宗教隔离，宗教歧视，宗教仇恨和宗教战争，也避免让一些别有用心和社会政治力量，继续假借宗教信仰的名义，挑动社会群体间的冲突，民族间的仇恨，以至国际间的战争。但是，近二三十年来的现实是，狭隘的民族主义与极端的宗教派别相结合，在世界范围里制造了种种灾难：社会暴乱，种族仇杀，地区战争，几乎没有哪种重大的血腥事件没有利用过宗教信仰的名义。一些具有全球性影响的学术权威，也打出传统文化决定论的旗子，把世界分割为几大块，当作世界冲突不可避免的根源，而宗教观念又被视为传统文化中最稳定的因素。于是宗教信仰似乎不再是人间理应相互尊重、和平与友好联系的纽带，倒成了相互隔离、必然成仇的理由。在我看来，这是世界的不幸，也是宗教的不幸。

关于引发社会冲突和国际战争的原因很多，性质也有极大的不同，当然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单纯的宗教信仰不是社会冲突和国际战争的根源，它们的真正原因，说到底，要从经济和政治利益上探求。为了避免纯正的宗教信仰被人恶意地歪曲和利用，或不自觉地卷入肮脏或血腥事件，坚持宗教信仰自由，把宗教信仰当作纯粹个人的私事，从而与政治分离，与教育分离，这是一条基本出路。如果宗教信仰变成人们真的可以自由取舍，那么人们就可以不再受特定的宗教团体及其信条的束缚，人们的社会活动，包括经济和政治活动，也就有了更大的空间，享有更多的自由。从这个意义上说，宗教信仰自由，既是和平友好的一种保障，也是个人全面发展的需要。如果没有宗教信仰上的自由，所谓个性，所谓自由，大约很难实现。

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失败以后，宗教领域发生的最

大变化，是被迫废除了神道教的国教地位，在宪法里规定政教分离，实行宗教自由。这使许多被压制的宗教派别得以解放，也使曾经被拴到军国主义战车上的一些宗教团体得以解脱，这是值得庆幸的。不过，当宗教信仰真的成为个人的私事时，又会出现许多新的问题。即以日本为例，新兴宗教层出不穷，其中相当一批，实行的是家长制，搞人身依附，以至骗财骗色，时有所闻，同时也为邪教培植了适宜的土壤。于是，人们又被禁锢到另一种形态的宗教牢狱中，难以自拔。这是维护宗教信仰自由的最新课题，此中的前景，亟待观察。但这已经超出了本书讨论的范围，只好打住。

杜继文

2001年1月

引 言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已经过去五十多年了。可是，近些年来一些军国主义阴魂附体的日本右翼分子却时常跳出来，要给世人制造点不和谐的音符，要冒天下之大不韪。

实际上，二战结束后日本国内一直存在着了一股否认侵略历史、美化军国主义的逆流。这股逆流开始时还有一股暗流，现在竟然敢公开地招摇过市了。1972年中日邦交恢复后，日本首相三木武夫以私人身份参拜靖国神社，之后的中曾根康弘干脆连私人身份这件外衣都不要了。1982年日本文部省强行修改教科书，将书中的“侵略华北”、“全面侵略中国”等字句中的“侵略”一律改为“进攻”或“进出”，把南京大屠杀改称“占领南京”。1984年拓植大学讲师田中正明出版《“南京大屠杀”之虚构》一书，妄称南京大屠杀是中国人“虚构出来”的“无稽之谈”，而指挥大屠杀的刽子手松井石根被处死是“蒙受不白之冤”。1986年文部大臣藤尾正行称日本在南京进行的屠杀是“为了排除抵抗”。1988年国土厅长官奥野诚亮也否定南京大屠杀，并宣称“日本一直不是一个侵略国家”。原运输大臣、现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声称南京大屠杀是“中国人捏造出来的谎言”。此后，日本政界类似的让中国人民和亚洲人民不愉快的“失言”就更多。1995年由自民党国会议员参加的旨在否定侵略历史的“历史研

究委员会”出版了《大东亚战争的总结》这本书，再次抛出了“满洲不是中国的领土”、“日本是为了自卫而出兵亚洲的”、“南京事件是虚构的”等论调。由此可见，每隔一段时间，日本总有一小撮人跳出来公然否认侵略战争历史，而且近年来有愈演愈烈的趋势。

二战结束以来，军国主义在日本之所以一直阴魂不散，是有其深刻的历史、社会背景和政治原因的。按常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的审判，应该将日本军国主义彻底铲除，但当时美国为了利用天皇制占领和统治日本，没有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追究裕仁天皇的战争责任，并让日本旧的国家组织和人事系统得以部分地保留下来，这就为后来的日本埋下了祸根。特别是冷战时期美国推行扶植日本以遏制中国的政策，不惜对军国主义残余势力姑息养奸，如1950年下令释放所有日本在押战犯，甚至连“731部队”的头目也因向美军“提供研究成果”而逍遥法外。这些残余势力后来又重返政界，掌握了日本的政治大权。其中1957年出任首相的甲级战犯岸信介就是典型代表。由于日本错过了全面清算侵略历史和战争责任的机会，致使支持军国主义的“皇国史观”也未能得到彻底根除。皇国史观认为日本的天皇、国土、种族、宗教等都是世界上“最优越”的，将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说成是“自存自卫”和“解放亚洲”的“正义战争”，将为侵略战争卖命视为效忠天皇、“为国捐躯”。上面讲的教科书问题、参拜靖国神社问题、否认南京大屠杀以及政客们一再“失言”都是根深蒂固的皇国史观在作怪。另外，日本一些战犯遗属不愿承认他们的父辈侵略过别国，不敢正视日本在中国和亚洲各地犯下的滔天罪行，相反认为其父辈是“为国捐躯”，所以反对用“侵略战争”这种称谓。他们的这种心情很容易被右翼势力蛊惑利用，从而形成军国主义的同情势力。随着日本成为经济大

国，皇国史观中的“日本民族优越感”更容易抬头，“新国家主义”意识急剧膨胀。他们觉得承认侵略并向亚洲国家谢罪是“自虐”行为，会影响到日本的“形象”。

1999年，我走访了日本的东京、冲绳、京都、大阪、广岛等城市和地区。在冲绳和广岛，我对日本人所讲的和平感触很深。冲绳是二战期间惟一一次发生在日本本土上的战争的战场。据称，在美军登陆作战中丧生的那霸市民达15万人。我先参观了和平祈念资料馆，接着又去参观了和平墓地公园。祈念馆的墙上贴满了许多少女的照片，她们都是女子学校的学生，20岁左右，被征去做护士而死在炮火中。墓地公园则整齐地排列着近20万个坟墓，这些人都是在战争中死于非命的。众所周知，广岛和长崎是二战中遭受原子弹袭击的地方。在广岛和平公园参观时，我目睹了当年原子弹爆炸后的惨状。看着那些在原子弹爆炸时的高温中变形的玻璃瓶，看着那块被烧焦的肌肤和指甲，以及在冲绳和平祈念馆中见到的那些天真可爱的少女们的照片，我不由得对无辜受害的日本人民产生了深深同情。同情之余，我又觉得非常遗憾。因为无论是在冲绳还是广岛，除了展示战争是如何给日本人带来灾害之外，似乎完全没有思考到底是谁发动了这场不义之战，到底是谁应当承担战争的责任。尽管日本人民也是战争的受害者，也值得同情，但日本却是一个施害国，决不是受害国。我不知道冲绳县政府和广岛市政府举办这些展示时是无意中疏忽了这一点还是别有用心？

显而易见，无论是日本人还是所有的亚洲人，都有必要对半个世纪前的那场战争重新进行认真的反思，所有世界公民都有必要帮助日本人进行深刻的反思。反思是一个永远不会过时的话题。本书的写作正是抱着这一目的对日本佛教所作的反思。

通过明治维新，日本历史由封建社会过渡到近代资本主义社

会。20 世纪初，以天皇为首的地主资产阶级政权进入帝国主义阶段。日本帝国主义是带有军事封建性质的帝国主义，对内实行残酷的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双重压迫和剥削，对外进行侵略扩张，在对中国、朝鲜和其他国家发动的野蛮的侵略战争中犯下了累累罪行。在近代历史的转变过程中，日本佛教也由江户时期的“准国教”下降为神道教的附庸。面对局势的变化和自身地位的衰落，佛教界也开始谋求新的出路。从总体上看，20 世纪前半叶日本佛教的绝大部分宗派都积极追随军国主义政府，提倡迎合统治者需要的“忠皇爱国”思想，宣传“护国”精神，为政府推行军国主义政策、建立法西斯集权统治和对外发动侵略战争服务。他们用佛教思想美化法西斯统治，将侵略战争说成是“以大道征服不道”；帮助政府进行愚民教育，被政府当成阻止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思想传播以及镇压工农运动的工具；随着日本对朝鲜、中国的侵略扩张，佛教各宗也加紧组织对出战士人的家庭、战死者亲属的慰问和援助，对伤残士兵进行救护；此外还向前线军队派遣随军僧，让他们在战地传教、慰问士兵，为死者安葬和举行法会等。与此同时，一些反对军国主义、反对侵略战争的进步的佛教宗派则遭到政府的迫害和镇压。

关于侵略战争中的日本佛教，日本和中国的学者们在研究日本近现代佛教史时已经作了一些研究，尤其是日本，对有关史料进行了认真、系统的收集和整理。但是，作为一个专门课题进行研究在日本也是比较少见的，在中国则更是第一次。本书着重探讨的问题为：①20 世纪上半叶日本佛教在本国法西斯政府大力推行侵略战争这一特殊历史背景下的形态变化，如组织结构、传教方式、传教内容等。②净土真宗、日莲宗等佛教宗派在占领区传教的具体经过和为侵略战争服务的具体罪行。③日本佛教在占领区的传教活动对这些地区佛教的发展所造成的影响和后遗症。

④部分佛教宗派反对军国主义和侵略战争的历史。

为此，本书第一章重点介绍了古代日本佛教与政治之间的关系、江户时代佛教的“准国教”地位、明治时期佛教与社会的新调适、迈向军国主义时期的佛教、佛教与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第二章专门探讨二战时期的日本佛教，具体内容为：战时宗教总动员体制与佛教、为法西斯主义服务的佛教界、战争体制下惨遭镇压的佛教教团。第三章探讨日本佛教诸宗在韩国的传教，内容涉及日本帝国主义变朝鲜为其殖民地的过程、日本佛教诸宗派——帝国主义的帮凶、殖民统治下的韩国佛教等。第四章为日本佛教诸宗与殖民统治时期的中国台湾佛教，内容有曹洞宗等宗派在台湾传教的具体情况、曹洞宗与“南瀛佛教会”的成立、殖民统治下的台湾佛教等。第五章叙述日本佛教诸宗在中国东北地区的传教情况、佛教与石原莞尔的“最终战争论”、中国佛教界的正义呼声等。



作者简介

何劲松，安徽舒城人，1962年生，哲学博士，研究员。

198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获史学硕士学位。同年9月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日本东方学院攻读博士研究生，获中日联合培养哲学博士学位。1991年底至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工作。现任世界宗教研究所佛教文化艺术室副主任、中国宗教学会现代宗教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书画家协会主席等职。

治学方向为中、日、韩、越等汉文化圈内各国佛教的比较研究以及传统佛教的现代意义、佛教与书画艺术等领域的研究，已出版《日莲论》、《创价学会的理念与实践》、《韩国佛教史》（上、下卷）、《红炉点雪》等专著，同时还发表了相当数量的学术论文、书法作品和散文。自1990年起，曾多次访问日本、韩国、越南、加拿大等国，进行广泛的学术文化交流。